

红色

年轮·将帅系列

滕叙尧◎著

揭开中国高干子弟最集中之地的神秘面纱
再现开国元勋子女们的真实生活



开国元勋的子女们（精选本）

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红色

年轮·将帅系列

滕叙充◎著



开国元勋

的子女们（精选本）

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国元勋的子女们 (精选本): 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 / 滕叙究
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218 - 07029 - 2

I. ①开… II. ①滕… III. ①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5059 号

开国元勋的子女们 (精选本) ——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

滕叙究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卢雪华 黎 捷

封面设计: 艺和天下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7029 - 2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83781421

目 录

002 情系太行山——记刘伯承之子刘太行

哈军工第七期学员，刘伯承元帅和老红军汪荣华的长子。长期在空军从事国防科技领导工作，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退休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022 父亲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记罗荣桓之子罗东进

哈军工第八期学员，罗荣桓元帅和老红军林月琴之子。长期在第二炮兵担任领导工作，第二炮兵副政委，中将，退休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054 女儿心中的丰碑——记左权之女左太北

哈军工第八期女学员，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烈士和老八路刘志兰之女，彭德怀元帅的干女儿。长期在国防科研单位从事技术工作，改革开放后任航空航天部技术领导干部。

076 飘逸而充实的人生——记谢觉哉之子谢飘

哈军工第八期学员，中共元老谢觉哉和老红军王定国之子；“文革”中被迫从空军转业到工厂当工人。改革开放后长期在中国外经贸系统和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工作。

090 一生都谨记父教——记林伯渠之子林用三

哈军工第九期学员，中共元老林伯渠之子。“文革”中在天津某工厂做工程师，改革开放后从政，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国家劳动保障部副部长等职，退休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12 诗情父子——记陈毅之子陈丹淮

哈军工第九期学员，陈毅元帅和新四军老战士张茜之子。毕业后一直在部队从事国防科技和管理工 作，任总装备部科技委副主任，少将。退休后担任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140 “军事父子”的报国情怀——记粟裕之子粟戎生

哈军工第九期学员，粟裕大将和新四军老战士楚青之子。毕业后一直在野战部队任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 将。退休后担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和全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160 我军信息化建设的拓荒牛——记张爱萍之子张翔

哈军工第九期学员，张爱萍上将和新四军老战士李又兰之子。“文革”中深受迫害。他从工厂普通技术员干起，成长为我军信息化建设的杰出专家。第二炮兵副司令员，中 将。

182 历尽劫难，不改赤子之心——记林彪之女林晓霖

哈军工第九期女学员，出生于苏联，为林彪元帅和老红军张梅之女。“文革”中深受迫害。改革开放后，在国防科工委情报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212 感受父亲的高风亮节——记邓子恢邓淮生

哈军工第十一期学员，中共元老、副总理邓子恢和老红军陈兰之子。“文革”中当工人，改革开放后一直在燃化部从事技术进出口工作。

230 搏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记杨应彬之子杨小斌

哈军工第十三期学员，广东省委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和老革命郑黎亚之子。“文革”中受父母冤案株连，改革开放后在国企工作多年，之后下海，成为企业家。

1952 年秋，陈赓大将创办哈军工的初期，困难重重，首先就有生源上的问题。陈毅元帅曾公开号召中央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哈军工读书，以此影响全社会。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哈军工的成功办学，声名鹊起，社会应届高中毕业生都以报考哈军工为荣，特别是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包括革命烈士子女）更把哈军工定为报考理工科大学的首选目标。

哈军工高干子女（含烈士子女）究竟有多少人呢？历史档案里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依笔者的粗略估计，应该占学生总数的 6% ~8%。

1970 年夏天，最后两期哈军工学生毕业，随后，被肢解成四大块的哈军工开始向长沙、西安、重庆搬迁，这所生存了 18 年的著名国防高科技学府不复存在了。

光阴荏苒几十年，当年那些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哈军工干部子女学员基本上都退休了。回望人生路，他们走得如何？

情系太行山

——记刘伯承之子刘太行

哈军工第七期学员，刘伯承元帅
和老红军汪荣华的长子。长期在空军
从事国防科技领导工作，空军指挥学
院副院长，少将。退休后担任全国政
协委员。



一、从延安保育院到北京 101 中学

1939 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刘太行出生在太行山辽县（今左权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那正是杨柳吐絮、桃花含苞的阳春三月，父亲刘伯承军务倥偬，不在母亲的身边，母亲看着方头大脸大眼睛的儿子，多像他的父亲啊，心中充满了做母亲的甜蜜，她给刘伯承写了一封报喜信。父亲回信说，儿子就叫“太行”吧。后来父亲告诉太行，根据刘家的家谱，你是太字辈，又生在太行山，所以起名“太行”。

刘太行的母亲汪荣华是一位 1931 年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她出身贫苦，十四五岁就参加了红军，在红军部队中长大。她与父亲是在长征途中结婚的。结婚几天后，在一次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空袭中，父亲和母亲都被炸伤。

军旅中的母亲产后没有奶，望着嗷嗷待哺的小太行着急上火，后来，好不容易从河南难民中请到一位奶妈，这才艰难地把小太行哺育到一岁多。

1940 年夏，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奉命从山东回延安，路过太行山区，当时百团大战已经打响，正在指挥作战、率部杀敌的父亲就托徐向前把儿子带回延安，交给朱德总司令带养。如果是现在，从山西乘车到延安可能十几个小时就到了，但在烽火遍地的战争岁月，要通过多道敌人的封锁线，徐向前一行人背着小太行整整走了一个月。

到延安以后，刘太行就生活在延安保育院，那时叫洛杉矶保育院（因为是美国洛杉矶华侨捐建的），周末的时候，朱德和康克清就乐呵呵地把刘太行和罗瑞卿的长子罗小卿（罗箭）领回家。

刘太行回忆说：“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没有生育，朱老总的女儿朱敏（与前妻所生）在苏联，他们身边没有孩子，他们就把那



1940 年，刘伯承怀抱 1 岁的儿子刘太行。

些父母在前线的孩子接到家里。总司令和康妈妈对我非常好，让我感到了父母的爱。我叫朱德‘朱爸爸’。”

刘太行的大妹妹刘华北出生后也送进延安保育院，那时保育院的条件很艰苦，几个阿姨要照顾几十个孩子。一次不小心，刘华北和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就摔到了取暖的炭火盆里，刘华北的脸部被烧伤，邓林的胳膊也被烧伤。

1943年10月，刘伯承夫妇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他们第一次去洛杉矶托儿所看看两个孩子，父子相见出现了有趣的一幕。

阿姨把太行和华北带到活动室，丑子冈所长连忙介绍：“太行、华北，你们的爸爸妈妈来看你们了！”

太行和妹妹愣在那里，瞪着眼望着两个陌生的大人。僵持片刻，太行小声嘟囔道：“我们的爸爸是刘伯承，还有朱德爸爸，他们是谁？”

刘伯承笑呵呵地走过来：“我就是刘伯承啊！”

太行摇摇头：“我刘伯承爸爸在前线领兵打小日本，没有时间来看我们。”

“我刚从前线回来的。”刘伯承解释说。

太行脑袋一晃，反问道：“不可能，你回来了，那谁打日本鬼子？”

“还有邓小平叔叔、李达叔叔……八路军都在打鬼子。爸爸这次回延安开会，是毛主席、朱总司令让我回来的。以后我还去前线，明白吗？”

“那……我怎么没有听到朱爸爸说过呢？”

“这是军事秘密，你朱爸爸怎么会告诉你呢？”

太行将信将疑，他还有问题：“你从前线回来，怎么没有枪？”

“我当然有枪。”刘伯承掀开衣襟让儿子看一眼。

“能拿出来让我看看吗？”

刘伯承犹豫一下：“能。”他从枪套里抽出手枪，卸下子弹夹，递给儿子：“看吧。”

太行乐了，赶快接过枪：“嗨，真漂亮……”他反复端详手中的宝物，又抬头问道：“是勃朗宁吗？”

“对，”刘伯承笑逐颜开，“小家伙还真识货！”

“德国造。”太行骄傲地补充一句。

刘伯承看看丑子冈，奇怪地问道：“他从哪里知道这么多？”

丑子冈笑道：“我们这里有个男阿姨，就是你给调来的小赵，他教这些

男娃的。”

刘伯承又面向儿子：“太行，能把枪还给我吗？”

“这枪真好！”太行有点舍不得，“那就还给你吧！”

“我是不是刘伯承爸爸呀？”

“像。”太行红着脸，难为情地低下头。

刘伯承大笑：“哈哈，看了半天，我只是像，还没有承认我是爸爸！”

刘伯承夫妇把太行兄妹接回家，太行仍不习惯叫爸爸，而是叫“刘爸爸”。1945年夏季，父亲去太行山，又把太行交给朱德总司令。不幸的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的一个漆黑的夜晚，5岁的妹妹华北在保育院被混进来的敌特杀害，妹妹死得很惨。这个悬案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破案。父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从来不提妹妹的事，妹妹的死在父亲的一生中都是抹不去的伤痛。

1946年，刘太行随父母离开延安到河北，在邯郸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又重回太行山。他到了上学的年龄。上个什么样的学校好呢？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的同志为此向他建议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坚决不同意，把太行送进了武安县一所农村小学。太行和普通农村孩子一样，坐在破旧、简陋的教室里，课桌是土砖搭起来的，坐的凳子全是石块土砖堆成的，上面垫了些木板或麦秸草。

1949年年底，父亲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为了让孩子们好好读书，父母把刘太行和妹妹留在北京。

从八一小学毕业后刘太行先在北京第四中学读书，开始仍住在朱老总的家里，后来朱老总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20多个孩子打地铺，实在住不下。父亲当时在南京创建军事学院，来信说：“总司令家里人多，你换个地方吧。”

1952年，邓小平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父亲就把刘太行交到邓家，卓琳是刘太行的监护人，卓琳阿姨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那时候，刘太行转学到101中学，可没有读多久，竟害了一场重病，结果只得病休一年。为了治好刘太行的病，刘邓两家的母亲电话不断，操尽了心。

从小到大，刘太行很少和父母在一起，初中毕业后，父亲说：“太行这孩子，从小就没有和我们在一起，跑野了，现在我要自己管，高中要到南京上。”

高中的三年，刘太行在南京两年，在北京一年。

二、帅府家风

新中国诞生了，戎马半生的刘伯承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进城初期，他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我们许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吃乡亲们的红薯干和小米粥长大的。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绝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

1951年，刘伯承全家从重庆搬到南京，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幢二层小楼里。当时全军还是实行供给制。刘伯承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账，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他还关照炊事员说：“黄瓜、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太贵，不要买来吃。”

那时家里已经有了四个孩子：长子太行，二女儿弥群，三女儿解先，小女儿雁翎。到南京后，汪荣华又生了两个儿子：阿蒙和太迟。孩子一天天长大，住房渐渐紧张起来。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刘院长家加盖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刘伯承拒绝了。后来，营房部趁他到北京开会，在他家的楼房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刘伯承从北京回来，严肃批评营房部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人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了！”后来，他坚持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住。

刘伯承夫妇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不让子女有优越感。汪荣华也常对子女们说：“警卫员、秘书是上级分配给爸爸工作的，除他之外，我们家属子女谁也没有使用的权利。”

刘伯承的车一般不准家属坐，夫人汪荣华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骑自行车。每年放寒暑假，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开学时离开南京，也不允许用车接送，而让孩子们自己乘公共汽车。

在刘伯承的电话间里贴着汪荣华写的一张“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这张告示，刘伯承的六个儿女都严格地遵守着。

刘伯承教育孩子的方法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南京刚解放的时候，刘伯承是南京市市长。有一天，他带着孩子去参

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接待参观者。太行好不扫兴，他想，爸爸是市长，跟管理中山陵的干部说一声，不就进去啦？

中山陵的负责干部闻讯急忙赶来，对刘伯承客气地说，欢迎首长来参观。然而，刘伯承说声：“谢谢，要按着规定办事啊。”他竟转身带着孩子回家了。一路上他还给孩子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我爸爸武将的声名在外，实际上是个书生。看得最多的就是历史、军事、俄文的书。”在刘太行记忆中，父亲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看书，一钻进书里什么都忘了。有一次，孩子们在楼上闻到一股橡胶烧焦了的臭味儿，赶快跑下楼看，原来是电线短路了，可在楼下看书的父亲全然不知，还捧着书端坐在椅子上。

最令刘太行佩服的是父亲读书功夫之高，不仅博闻而且强记。刘伯承眼睛失明之后，让孩子们找书，书放在哪里，要找的内容大约在哪一页，他都清清楚楚。

对于孩子读书，刘伯承的要求极其严格。刘太行10多岁的时候，学习的自觉性比较差，一到放暑假，心里总想着玩。尽管刘伯承工作很忙，但对抓儿子的学习可一点不放松，还经常抽出时间检查一下。除了要求太行完成学校留的暑假作业外，还要求他背诵一些文章。例如，鲁迅的散文、毛主席的讲话、《史记》的文章。刘伯承非常喜欢读一些古文。他对儿子说，这些古人的文章写得真好，你是中国人，要会说中国话。背了他们的文章，跟着他们学，你的中国话就会说得好了。

由于玩心重，边玩边读书，有一回，刘太行一失手把一本新书撕掉了半页。在给刘伯承背书的时候，让刘伯承发现了，刘伯承并没有发脾气，而是耐心教育太行，还拿出他在抗战年月里在太行山读过的书让太行看。那时候的书都印在褐黄色的土纸上，年头又久，可让太行惊奇不已的是，这些书还是平平整整的，书里有刘伯承写的眉批，还有不少补贴的地方，书中的字迹仍然十分清楚。

刘伯承对太行说：“书是个老师，而且是个百问不烦的老师，随便你问它多少次，书从来不会生气发火，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因此，你要爱惜书。”

看到儿子红着脸认错了，刘伯承就找来白纸，把撕掉了半页的书粘贴好，又用毛笔一笔一画地把缺页的内容写上去。刘太行永远忘不了父亲像

个绣花工人那样低头屏气，仔细补书的神态。

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元帅，对子女的教育却是心细如发。有一次，刘伯承到北京开会，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中午，匆匆把刘太行兄妹俩叫到住处。午饭后，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中国青年》，让太行和妹妹读上面的一篇文章《审判后的谈话》。那文章是说一位教授的儿子犯了罪，受审后他父亲发表的谈话。晚饭的时候，刘伯承回来了，一边吃饭一边对太行兄妹说：“由于爸爸为革命作了一些贡献，党和国家给爸爸优厚的待遇，你们是子女，近水楼台先得月，你们沾光了……你们在北京，又住在叔叔阿姨家，他们很爱护你们，又是客人，你们要求什么他们总是满足你们。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头，容易产生骄傲自大的思想，其实你们真是一点本事也没有啊，千万不能学习那个教授的儿子。”

最后刘伯承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戏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唱戏要靠真本事啊。”

刘伯承早在子女结婚之前就立下规定：结了婚的子女一律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他为此多次向儿女们解释：我这里生活条件优裕，这是党和国家为照顾我而安排的。你们结了婚，就不要住在这里了。

一些跟随刘伯承多年，看着他的子女长大成人的同志感到这样太委屈孩子了，就在会上给他提意见：“首长太不近人情，子女结婚是大事，暂住一下家中都不让，太过分了吧。”

刘伯承微笑着摆了摆手，说：“我的住房是国家给我的，供我学习办公之用，孩子成人之后，就是社会的一员。他们再住我的房子，就情理不通了，那只能说是靠我这个父亲，才有房子住。试问老百姓能行吗？什么叫特殊？这么办就叫特殊，群众知道了，就不服你共产党的气。”

刘伯承多次告诫子女：我这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

三、儿子眼中的父亲

当刘太行脱掉童年稚气，从戴红领巾的顽皮少年成长为和父亲一样高大的英俊青年以后，他一直渴望从理性上去深刻了解父亲的一切。

在家里，在刘太行六兄妹心中，父亲既是一位慈父也是一位严父，父

亲性格内敛，酷爱读书，很有学问。清末时，父亲曾参加县里科举考试，但因祖上是吹鼓手，竟被除名。为了推翻黑暗的社会制度，父亲走上反清、反袁、反蒋、抗日、追求真理的革命道路，戎马一生，但父亲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书，即使打鬼子时，身边也带着书。父亲曾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父亲不吸烟、不喝酒、不玩牌、不跳舞，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他生活规律、自奉俭薄、严于律己。对同志、对家人、对孩子，都非常有责任感、非常细心。

父亲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对事业极端负责任，不随波逐流，而这个特点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不了解的情况除了尽力去了解外，从不表态。父亲是1923年受伤的，在四川养伤，熊克武以升官为诱饵，请他出山带领部队，他回绝了，因为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认清了他们的本质。后来四川共产党领导人吴玉章、杨闇公请他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当时不了解共产党，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只是愿意随吴玉章出川，到贵州、湖南、上海、北京和广州考察，考虑成熟后，于1926年5月才决心加入共产党。

从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一直到1962年的对印度自卫反击作战和1964年的东北边境战备考察，父亲的军事生涯已走过50多年。他的国民党老对手白崇禧曾经称他是“共军第一悍将”，蒋介石也曾经长叹手下无人堪比刘伯承。他的老上级朱德更是称赞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是“军事的奇才”。邓小平曾经称赞自己的老搭档为“大知识分子”，并且认为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可父亲习惯于把自己称作为“军事专业人才”。他说：我是个专业人才啊，我的专业是什么？打仗，指挥打仗。在打仗过程当中，也在研究作战理论问题。

父亲的晚年，眼睛瞎了，他还对医生说：“医生，我对你要求不高，你给我拿个放大镜，我只要能看地图，将来打起仗来，我给参谋部出个主意就行。”这就是父亲的敬业精神。

战争年代，父亲撰写和翻译了大量军事著作。并且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几十年矢志不移。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归来，他先后担任过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的红军大学校长；延安时期，他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他还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

在开创新中国的军事领袖当中，父亲大概是最早离开了政治中心的一位，他向毛泽东主席辞去一切党政军的领导职务，请缨办学。1951年，担

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他亲自主持创建了解放军的第一所培养中高级干部的正规学府。作为最早倡导解放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高级将领，他自命为“教书先生”，他自己备课，自己登台讲课。在战争年代，父亲多次受伤，身上被打了9个洞，在元帅里边，大概就他最多了，在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里一直没有得到休息，又去干办大学这样伤脑筋的事，所以老是脑袋疼。刘太行亲眼看到一眼失明、一眼弱视的父亲拿着放大镜伏案工作，亲自校阅和审定大量的外国军事译著和自编教材。三个月后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报告里头有一句话，就是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学习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毛主席给他改了，改成“毛主席号召要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

军事学院的学生，大多是来自军队的各级干部，其中很多人已经是战功赫赫的将军。父亲从亲自检查宿舍卫生开始，逐步进行“建立正规制度”和“学习新兵种战术”的工作。从1951年到1956年的五年间，父亲勤勤恳恳，克服种种困难，先后成立了12个系，教学内容不仅涵盖陆海空三军，还包括军事、战史和政治，把军事学院办成一所综合型的最高军事学府。

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军事学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起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

1957年8月，身体日益见差的父亲主动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

1958年的5月，为期两个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7月，正在上海治病疗养的父亲，接到军委的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

66岁的父亲抱病坐上火车，在车上也没睡好，下来以后眼睛都是红的，母亲要求先让父亲到医院检查一下，不让检查就直接弄到会场上去了。在中南海怀仁堂，父亲在1000多位老战友和老部下的面前作检查，结果，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父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59年1月19日，他带着全家从南京移居北京。

父亲是一个不爱讲自己辉煌历史的人，在家里，他从不给孩子们讲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他的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的血战，但是他却厌恶战争的残酷。在刘太行的印象里，父亲一直不愿意看打仗流血的战争影片。只要电视上出现了战争情景，他立刻就关掉电视或者换别的频道。在父亲看来，

即便是淮海战役那样巨大的军事胜利，面对的也只是自己的同胞。父亲经常对刘太行说，他自己只是一个“幸运者”。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刘太行想让父亲给自己讲讲淮海战役怎么打得那么漂亮，父亲却说了这么一段话：“太行，你知不知道，你每次一问我这些，就让我想到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多少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我心里很不安。我是幸运者，活过来了。那些牺牲的人，才是对革命起了巨大作用的人，贡献更大啊！”

高中的时候，刘太行博览群书，兴趣广泛而多变，他理科学得不错，但更喜欢文科。和父亲说起今后考大学想学文科，父亲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像你这样的人学文不行，无大才大德啊，我对孩子没有大的要求，还是学技术吧，自己能自立就好。”

父亲希望刘太行考大学要学工科，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刘太行常说，他的性格不像父亲，自己是一个话很多的人。父亲曾对他说，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乱说话是臭狗屎。

四、走进哈军工

1959年夏，刘太行高中毕业要升大学了。赋闲在家的刘伯承一改抑郁的表情，露出难得的微笑，主动问起大儿子的升学打算，刘太行先征求父亲的意见，刘伯承说：“你不是一直想当兵吗？到哈尔滨，上军工吧！”

那个年代，中国的青年人有谁不向往松花江畔那所神秘的军事科技学府？刘太行愉快地接受父亲的意见，报考哈军工。

刘太行拿到哈军工的录取通知书，家里人都祝贺他，弟弟妹妹们好生羡慕大哥。喜气盈门之际，刘伯承提议：“太行长大了，要远离家门去当兵了，咱们全家照个全家福吧！”

阳光柔和，惠风和畅，太行兄妹六人，加上一个堂姐，簇拥在老爸老妈的身边，在庭院里留下一张宝贵的照片。

临行前，和太行一起上哈军工的罗东进特地来看望刘伯伯，他们俩又去探视病中的陈赓叔叔，那天陈赓院长特别高兴，谈了许多国际尖端武器发展的情况，鼓励他们到学院后努力学习，为今后从事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陈赓还叮咛道：“你们有没有对象呀？我今年可是招收了女生的，不要着急谈对象哦，要专心学习，以后才能做出成绩。”



1959年夏，刘太行到哈军工前夕的全家照。

刘太行和罗东进，这两位年龄仅相差一个月、情同手足的伙伴并肩走进哈军工大院。他们又一起进了导弹工程系，成为学习无线电控制专业的第七期学员。

新生入伍军训开始了，圆了当兵梦的刘太行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然而，没过几天他就知道哈军工的厉害了。几十年以后，刘太行告诉采访他的记者说：“哈军工对学员要求特别严格，比如出操，半夜一声号令，把我们叫起来，背上东西就往外跑，一跑就是数公里，现在的军校都不像我们哈军工出操那么严。在学习上，不论是谁，都没有特殊照顾，考试不及格，对不起，该留级留级，该退学退学，管你爸爸是什么人。”

第七期学员正好赶上庐山会议后的全国上下“反右倾”运动，农村来的同学说实话：人民公社搞早了，公共食堂更是胡闹，老百姓已经开始饿肚皮了……这还了得，大批判、大字报如泰山压顶，城里来的同学不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争做运动积极分子。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刘太行被运动弄得晕头转向，等他搞清楚挨批的同学都是说真话的老实人时，心中产生许多困惑，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说真话、说实话就那么难？

预科结束以后，刘太行的升本考核成绩不错，一开课就选上当课代表，哈军工的课代表是联系教员和学员的重要角色，在教学过程中责任很大，刘太行认认真真做好不算班干部的课代表。

刘太行不是太用功的人，然而课程的难度和数量逐渐加大，他常感难以适应，学习一吃力就有了畏难情绪，在第一个假期回家时向刘伯承讲起